

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证章

□李笙清

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证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由贺龙指挥的红军主力部队红三军的这段历史。证章为圆形,银质,直径3.8厘米,厚0.1厘米,重7克。证章正反两边的边缘均刻有不规则三角形一周,正面分为内外圈,外圈内刻有“中国红军第三军第廿四团一营一连”字样,按自左向右方向排列;内圈以栉齿纹围绕,自上而下刻有“汪德炳”三字,应为证章持有人姓名。证章背面外饰栉齿纹一周,上方自左至右刻有“登台口”三字。所有文字均为繁体,字体端正,刻划遒劲。

贺龙、周逸群等人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受挫后辗转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提出了在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1928年年初,贺龙、周逸群等由党中央派往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1月28日,贺龙一行到达洪湖新堤,旋即前往监利,在监利河口组织召开鄂西北特委和鄂中特委、监利县委、石首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将原鄂中特委领导的沔阳工农革命军、石首农民武装及原国民革命军二十军贺锦斋部集中起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由贺龙统一指挥。

此后数年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的需要,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时期汪德炳的银质证章(国家一级文物)。

的革命武装番号数度更名,先后出现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洪湖游击总队、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等多种番号。

1931年3月27日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按照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红二军团在长阳枝柘坪被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红三军下辖七、八两师,分别由王一鸣、许光达任师长。另外将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的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不久后将段德昌领导的洪湖独立团改编为第九师,段德昌任师长。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及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浴

血奋战,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发展,湘鄂西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大苏区之一,红三军全军官兵亦发展到1.5万余人。1932年夏秋期间,国民党出动10余万兵力对洪湖地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三军接战失利后被迫离开洪湖实行战略转移,苏区沦陷。

这枚证章的持有人汪德炳是洪湖县(今洪湖市)峰口镇登台口人,1930年冬天参加红军,在红三军第二十四团一营一连当战士,参加过多次对敌作战。1932年9月,汪德炳随红三军主力撤出洪湖,转战至湘鄂川黔一带,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打散,便在当地落籍,以务农为生。新中国成立后,汪德炳回到洪湖家乡,享受老红军待遇。

此银质证章为1931年冬在洪湖颁发,受条件限制,铸造和刻字、图案都有些简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湘鄂西苏区制造证章的工艺水平。数十年来,汪德炳一直将这枚证章珍藏在身边,哪怕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也没丢失。1977年夏天,得知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在组织流散革命文物社会普查,汪德炳便将这枚陪伴了他多年的红军证章捐出,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直陈列在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成为一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古莲花池四通碑刻 入选国家文物局 第一批名碑名录

保定晚报讯(通讯员柴汝新 夏佳琪)近日,古莲花池的“唐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明西夏文陀罗尼经幢”(2通)共计4通碑刻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唐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位于水东楼南,碑高238厘米,宽120厘米,厚36厘米,刻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集贤院学士徐安贞撰文,逸士苏灵芝书丹并篆额,太原王希贞刻石。碑额篆书“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碑文字体为行书,29行,每行60字。碑文简介田琬的家世与履历记述他莅任后实行“宽明”的政策使易州百姓财用阜足,心存忠爱,赞扬他经常巡视桑野,以德化民,使城乡“莫不竞者让,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因此百姓立碑为他存“令名”。徐安贞(671—743年),初名楚璧。龙丘(后改为龙游,1960年并入衡水、金华县,属浙江省)人,神龙二年进士。玄宗时为起居舍人,诏书多出其手,官至中书侍郎。苏灵芝,唐开元、天宝年间武功(今属陕西)人,官承奉郎、守经略军曹参军,以行书擅名,被欧阳修褒为“写碑手”。

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位于宸翰院东廊内,碑高354厘米,宽87厘米,厚74厘米,刻于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碑文记载老索家族四代人从蒙古汗国至元末顺帝100多年间的事迹,广泛涉及元朝的历史事件。欧阳玄奉敕撰文,苏天爵奉敕书丹,张起岩篆额。欧阳玄善词章,通理学,修宋辽金三史都担任主要编纂工作。苏天爵是元代书法家,为文长于序事,为官清廉。张起岩博学有文才,善篆隶,修宋辽金三史都担任主要编纂工作。

明西夏文陀罗尼经幢位于宸翰院东廊内,一高一低共两座,均有盖顶、幢身、基座三部分构成,幢身都是八角柱体。两幢都是稀什寺内西夏僧人的坟幢,均建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高者碑高263厘米,每面宽18厘米,共刻1029字,系为纪念圆寂的沙弥巴达那征而建。低者碑高228厘米,每面宽21.5厘米,共刻983字,为纪念圆寂的比丘师而建。此前一般认为,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建成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西夏文石刻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保定这一发现将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由元末推迟到明中叶,至少下延了150多年,一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

谁家闺秀凳上坐 ——民国绣墩欣赏

□浩渺

绣墩原是旧时大户人家闺房女子的标配,一般是专属女子的凳具。所以自明清以来,绣墩都做得清瘦秀雅,玲珑别致,生产商在选材和设计上都会穷其技能,盖因它是父母疼爱闺女的直接表现和重要载体。在形式上,除常见的圆形外还派生出海棠式、梅花式、八角鼓形等。材质有木、竹、藤、雕漆、瓷、石等,讲究一点的人家还要根据季节的不同而使用。比如夏季用瓷绣墩,取其清凉去燥。

我比较认可木质绣墩,四季皆宜,冬暖夏凉,是最可亲近的一种材质。我这对香樟木鼓形八角绣墩整体色彩以浅黄色为基调,间杂深褐色,再以渐变的绿色作为点睛之笔,使整个器物富有生机和希望。我看过一些绣墩,色彩过于凝重肃杀,给人以憋闷之感。这件绣墩色彩的变化也许点明了它的生产年代,我以为可能是在民国中晚期吧。社会正在发生大的变革,器物的色彩图案也跟着会发生变化。

这绣墩呈八角鼓形,四开光,一对也即八个画面。器物“开光”是一种极

好的装饰方法,框内多绘人物、山水、花鸟等,像一幅幅的连环画,既突出了所要表现的主题,又调剂盘活了整体画面,可谓一举两得。

这一幅开光画绘的是一位女子手抱琵琶,坐在一艘带棚的小船上,眉目紧蹙,仿佛有一肚子的心事,要借琵琶一泻而下,让周围的流水将其带走(图一)。

说实话,图中女子现在看一点也不漂亮,这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借此表明此画工当出自清代及民国。另一幅荷花图却是另一番景象:正中一朵硕大的荷花盛开着,荷叶苇叶舒展着,看来是个无风水暖的日子。一只翠鸟振动翅膀,热情地向荷花奔来……画面清新温暖,张扬着生活和生命的本真。

再来看一幅人物画。这位人物手把弓箭,另一只手握箭,脚上穿着战靴,一看便是习武之人。可其身姿柔和优美,小脚微别,仔细看来便晓得了,这应是替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图二)。

第四幅是一幅孔雀图。孔雀悠闲地站立于奇石一旁,看向一株盛放的牡丹,三朵花蕾蓄势待发。

其他图景还有倚在亭台栏杆信口



图一



图二

吹笛的女子,登枝而唱的画眉,闲庭信步的雄鸡……都是闺阁女子喜欢的。

具有现代意义的坐墩在五代时开始出现,元代有了瓷墩,明清时开始大量流行于上流社会和民间富裕人家。我小时候在乡间农村,无缘见到绣墩。在乡间,和绣墩相近的是一种叫坐柜的家具,方形,多刷深红色大漆,也有不刷漆,称做白茬的。高度与绣墩相仿,而且中空,里边可存放布匹和一些主人喜欢的小物件,这一点也和绣墩相似。小坐柜多放在农家主人的内室,有一定的尊贵性。

关于绣墩,我一直以为是闺阁女子坐在此物上做女红。现在知道,之所以称之为绣墩,是因为在上面要覆盖各种图案的丝织绣品。